

《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 学林漫话系列

远去的先生

《文史知识》编辑部 编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 学林漫话系列

远去的先生

《文史知识》编辑部 编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先生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13.8

(《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学林漫话)

ISBN 978 - 7 - 101 - 09244 - 8

I. 远… II. 文… III. 文史哲—名人—回忆录—中国—现代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 043597 号

书 名 远去的先生

编 者 《文史知识》编辑部

丛 书 名 《文史知识》主题精华本·学林漫话

责任编辑 包亦心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¼ 字数 17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244 - 8

定 价 38.00 元

写在前面

20世纪渐行渐远，在那已经逝去的时代里，在中国传统文史研究领域，曾涌现出众多精于治学、为人师表的“先生”。如今，先生已经远去，但他们的学行、风采依旧为人所怀念。《文史知识》杂志保有一个常设栏目——“学林漫话”，汇集了先生的亲友、学生所撰写的故事，寄托着追思，不经意间也串连起现代学术史的脉络。

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仅撷取41篇文章，由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侧面，来展现远去先生的神采。所选文章，一仍其旧，在每篇末尾注明原文发表日期，以应读者检索之需。

“学林漫话”的故事还将一直讲下去，我们还要为学林的繁盛继续尽绵薄之力。

《文史知识》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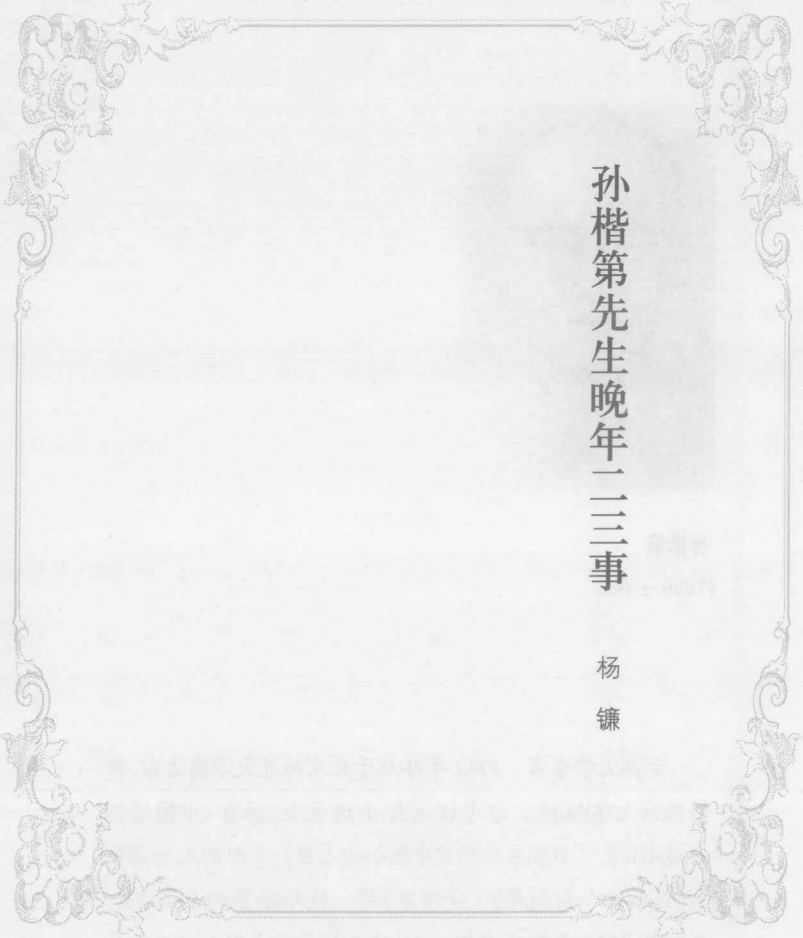
目 录

- 1 孙楷第先生晚年二三事 杨 镰
- 11 忆夏承焘师 蔡义江
- 23 回忆浦江清先生 吴小如
- 29 纪念缪钺先生 李崇智
- 37 回忆与余冠英先生的交往 王运熙
- 43 从古典到现代 陈平原
- 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
- 55 怀念卞孝萱先生 郝润华
- 65 我的学长兄曹道衡 邓绍基
- 75 怀念褚斌杰先生 张 鸣
- 83 遥知水远天长外 葛兆光
- 追忆金开诚先生
- 95 纪念王力先生110周年诞辰 齐冲天

- 103 魏建功先生二三事 刘尚荣
- 115 苦行修善果 姜昆武
——忆先父姜亮夫先生
- 127 季羨林先生与中华书局和《文史知识》 王邦维
- 137 心存三乐 学求通精 王继如
——追思徐复老
- 147 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吴寿松
——怀念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
- 155 父执赵俪生先生 陈无畏
- 165 缅怀沈祖棻先生 刘庆云
- 173 忆李长之老师 李修生
- 183 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 张 鸣
- 199 回忆父亲游国恩先生 游宝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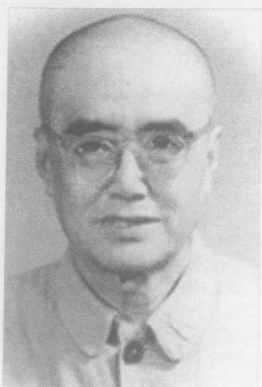
207	哲人虽萎 遗泽永存 ——忆程千帆先生对我的教诲与激励	吴在庆
215	回忆向觉明师	周清澍
231	布衣傲王侯 ——我的老师金景芳先生	宋德金
241	王有三（重民）先生百年祭	白化文
247	牟润孙的史学师承	牟小东
261	回忆恩师赵光贤先生	彭 林
271	想念阴少曾（法鲁）先生	白化文
279	怀念王永兴先生	阎步克
287	深切悼念周绍良先生	白化文
295	商鸿逵教授学术二三事	商 传
307	怀念王锺翰先生	董宝光

- 319 追忆邵循正师 周清澍
- 339 怀念周一良师 胡宝国
- 345 怀念雷海宗先生 王永兴
- 353 我印象中的老李 龚书铎
- 359 谭其骧与《中国历史地图集》 王文楚
- 369 求真、实证、新解
——谈石泉教授研究历史地理的方法 鲁西奇
- 379 恺悌君子 教之诲之
——张岱年先生与我的求学时代 陈 来
- 397 深切悼念任又之（继愈）先生 白化文
- 403 怀念朱伯崑先生 陈 来



孙楷第先生晚年二三事

杨
镰



孙楷第

(1898-1986)

古典文学专家。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燕京大学教授。以考证通俗小说见长，著有《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水浒人物考》、《也是因古今杂剧考》、《沧州集》等。他所编纂的小说书目，开拓了中国目录学的新领域，对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十年前，1986年6月23日，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现代第一人”的孙楷第先生于医院去世，享年88岁。

我生也晚，只是在孙先生一生的最后五年，才与他结识。在这五年间，我一直在他的具体指导之下从事古代文学与文献的研究，其中的收益，足可受用终身。这里所谈的孙先生的晚年，囿于自己的见闻，不但零碎，也有很大的局限。然而绝非道听途说可比。

1981年，我的第一本著作《贯云石评传》完稿，居然很快收到出版社的答复：决定接受书稿，要求我做一次认真的修订，尽快出版。当时，我手捧着文稿，激动得难以入睡，我下决心要开个好头：从第一本书开始就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可我又感到惶惑不安：我将从什么地方着手修改书稿呢？犹豫了几个月，我想到了孙楷第先生。写《贯云石评传》时，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是我的重要参考书，而且，从1981年12月起，我就是与孙先生在一个研究室上班的晚辈了，何不亲自上门向孙先生求教？那时候到底是年轻呀！说做就做。几天之后我真敲响了孙先生在建国门外的寓舍的门。

其实我早见过孙先生。五六十年代，他家与我家同住在北大校园里。我常在未名湖边和镜春园中见到孙先生的身

影，我与他的儿子还是北大附小的同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严谨、内向的前辈，不善于与人交往。敲开门，我就与另一个孙先生相识了。严谨还是那样严谨，可他随时愿意将自己毕生积累的经验讲给一个后辈听；内向归内向，这并不妨碍他去提携一个有志的青年。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开门见山：我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接着请教，为什么《元曲家考略》不包括贯云石？他回答：《元曲家考略》一书在结构时就不包括有碑传传世的人，其立意是为一群“隐而不显”的元曲家作传。但他相当关注作为元曲家的贯云石。当场，他拿出了自己的笔记，为我——初次见面的晚辈——提供了几条写《贯云石评传》初稿时我未曾见到的资料，其中有南宋遗民王炎午的《上贯学士》。他留下了《贯云石评传》手稿，并约定：下周二再谈。到下个周二，他已经读完了我手写的18万字文稿，可以说，他认可了我这个编外学生。

此后，我们几乎每月都见面。我向他汇报：自己看了什么书，有什么新发现。他就指导我分析消化新的资料。看似闲谈，却始终不出治学的基本内容。什么叫学问，其实既可体现在论著中、课堂上，也可以体现在这种闲谈过程。比如，在《永乐大典》中，我读到一首贯云石的佚诗《翰林寄友》，并抄给孙先生。其中涉及了元仁宗初期翰林院的学士们。孙先生首先关注的是弄清楚这些学士究竟都是谁。其中有这样一句诗“文郁老经学”，我说“文郁”应该是杨文郁，他想了一下摇摇头，说：没有见到杨文郁在皇庆、延祐年间活动的记载，这个翰林“文郁”实际是“文蔚”的笔误，文蔚是当时的翰林学士

尚野的表字。贯云石是畏吾（维吾尔族）人，他在翰林院只待了不长的时间，这种差异太正常了。说实话，当时我对孙先生的判断半信半疑。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前不久我读到一条新资料，说明杨文郁去世于元仁宗在位之前，证实了孙先生随口说出的推测竟是不刊之论。就这样，我每个月都在孙先生采光不好的起居室中听上几节文献入门课。

一年后，我在国家图书馆的一种孤本古籍《小山乐府》的卷首，发现了贯云石、刘时中等一组元人的序跋，这些新的文献，解决了不少以往未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元曲大家张可久的生年与字号等，我在孙先生指导之下，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天一阁旧藏小山乐府》，孙先生看了，鼓励有加，他说：他上大学时写的第一篇论文，由老师杨树达批了几个字：“做得好。可喜也！”如今他将这几个字送给我。这篇近两万字的论文，一共改了四稿，每稿写成都由孙楷第、吴晓铃分别批阅，孙先生用黑笔，吴先生用蓝色铅笔，从结构、引证资料到错别字，连批带改。至今这些批过的稿子已经是我个人珍藏的纪念品之一。该论文在《文史》辑刊上发表了，孙先生专门约我去谈了一个下午。他用我的文章与当时的另外一篇文章做了逐段分析，并叮嘱我：千万不要做自欺欺人的应景文字。那几年，我就是在孙楷第、宿白、张政烺、吴丰培、吴晓铃等老专家的客厅里，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1984年，我在元人文集中见到了一篇《张可久去思碑》，孙先生《元曲家考略》中的《张可久考略》中没有涉及这个文献。我曾问孙先生：您看到过这篇文章吗？他说：看到过。但我认为这个“张可久”，不是元曲家张可久。我说：是不是

因为那是一篇“去思碑”？他难得地笑了，说：然也。孙先生的意思是：元代为某人写“去思碑”，是有级别限制的。文献已经证实张可久终身只是做到吏，不会有人去为一个数十年沉沦下僚的小吏写什么“去思碑”。这只是同名人而已。通过几年的交流，孙先生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将他的毕生学养加注到一个初识门径的青年人身上。一次，我与学友王青平一起去看望孙先生，听说王青平正研究《斩鬼传》，孙先生针对《斩鬼传》的版本谈了一两个小时。就孙先生的“闲谈”我们查证了一星期，简直严丝合缝，如同专题讲座，发蒙解惑，要言不烦。王青平感慨地说：孙先生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严厉冷漠呀！我说，那要看谈什么。谈“学术腐败”他是严厉，谈名利他是冷漠。

从1984年开始，我在孙先生指导之下，协助他整理他的文稿。关于《小说旁证》，关于《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关于《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关于《曲录新编》，每一部著作，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一通里程碑。每一部著作也都是供我学习领会的范本。那时，我的兴趣在元代诗文文献上，在元代蒙古色目人物“双语化”文学现象上。但通过对小说戏曲文献的了解，实际上是为我指明了一条以文献为基础来从事文学研究的路径。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不论研究方向是什么，你为之花的工夫都不会白费。特别是几年来孙先生通过具体的细节，始终强调要我们立足于学术规范之上，对此我的感触真是越来越深。

1986年春，孙楷第先生患病住院了。

1986年元旦刚过，孙先生还给我写了一封信，答复了我的几个问题。我在他的指教之下为写《元曲家薛昂夫》一书

作准备。2月中旬，他突然呕吐不止，3月6日住院治疗。一再转院，病情也未能缓解。

作为私淑弟子，孙先生住院期间我正远在新疆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巴音布鲁克是著名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东归之后的聚落地，那里有中国惟一天鹅自然保护区，因此被称为“天鹅湖”。三十年前，一支那曲的藏族部落穿过青藏高原，也来到巴音布鲁克定居。我想就这些历尽沧桑的藏族与他们的女活佛的传奇经历写一本书。我已经住了几个月。当时，巴音布鲁克是中国交通与通讯最困难的地方之一，著名电影《天山深处》就因此而生。我不能及时获悉北京的情况。但按计划，我必须在8月份——大雪封山之前离开天山深处的牧场返回北京。我与孙先生约定，从初秋开始，协助他整理《小说旁证》。

等我回到北京，只能与孙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会面”了。孙先生生前要求丧事从简，将骨灰洒在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孙先生的骨灰最终安葬在北师大图书馆前的绿地，并且在其上植青松一株以为纪念。我在那棵松树周围徘徊了一个下午，并培土、浇水为酹。

实际上，孙先生后半生身体一直不大好，可1986年初情况更特殊。除了年龄，还有过度劳累与心情不佳。那时学术著作出版面临一些困难，而且孙先生自己保存的文稿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早已散乱难拾，而他又总是不停地校订批改自己的旧作，不愿仅是照原样重出。从1984年开始，他着手将写于二三十年代的《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整理成书。到1984年年底，这部埋没了近半个世

纪的著作，已经编成。1985年春节前后，孙先生兴致颇高，我们面谈时，他就整理并正式出版学界期待已久的代表作《小说旁证》专门做了吩咐。他计划用一年完成《小说旁证》的定稿，然后就是补充完成《元曲家考略》的最后十八个元曲家生平考证。同时，他还谈到了自己的另外一部文稿《曲录新编》，当时他笑着对我说：如果来不及完成《曲录新编》，就交给你来做。卢兴基先生曾说：我们很难赶上孙先生，因为他一辈子就只有小说戏曲。对这点，我的体会同样真切。

就在孙先生兴致勃勃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追寻他用毕生心血收集的数万册藏书的下落，成了他的心病。文化大革命初期，这批珍贵藏书全部散失了。当时他所在的文学研究所整个要下“五七干校”，他提出将藏书先寄放在所里的一间空房间，被工宣队拒绝了。等他干校回到北京，这些始终伴随他的书籍已经远远离开了他的视野。无书可读，就是他最后二十年间最大的痛苦。从80年代初开始，不断有人从琉璃厂等地的旧书店买到孙先生的藏书，其中还有他的手稿与批校本。这些“发现”，实际拉大了孙先生与自己书籍的距离。

关于孙先生的书，有这样一个掌故：当这批珍贵藏书散失后，很快就出现在许多旧书摊上，其中包括孙先生的手稿、精心批改的自己的著作。一天，著名的部队作家慕湘（长篇小说《晋阳秋》的作者）在隆福寺旧货摊上买到了一册《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闲时一看，发现书页写满了孙先生的批语，实际上是一部“改定稿本”。他是将军，也是文学家，他知道一个学者的甘苦。这不但是他们的

心血，也是他们毕生的寄托。他想不通怎么会将这样重要的书弃诸“商肆”，但他认为这必然与“文革”有关。于是，慕湘在书后写了一首题为《璧还孙楷第先生〈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改定稿本》的诗：

天上风云可预测，人间祸福无定时。古今典籍聚还散，得书失书寻常事。秦火隋禁明清狱，难比举国毁书日。穷探曲海杂剧考，改订待印弃商肆。偶见此书难释手，皓首通人春蚕丝。我今得书心虽喜，但念失者梦魂思。爱书颇知失书苦，怎如原书归原主。同是劫中失书人，相赠何必曾相识。

一九八一·七·一 慕湘

与孙先生取得联系之后，他放下繁忙的工作，专程找到孙先生家，将书籍璧还。见到慕湘，见到了自己遗失多年、本已不抱找回希望的书籍，孙先生百感交集。他讲述了这些书籍是如何遭逢“国难”的。在自己的日记中他称慕湘为“尚义君子”。他还说：就凭世上有慕湘这样的“真正好人”，他也要将这部著作尽快定稿交出版。事实上，慕湘送回的书，就是孙先生自存的底本。同时，他完全清楚，这毕竟是难得的缘分，绝大部分书籍是不可复得了。但是，他还寄希望能写出新的著作。一个几乎与20世纪同龄的老人，最后的一二十年仍然抱有信心：相信自己一生从事的研究必将惠及后人。

住院期间，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去看望孙先生。那时孙先生已经失语，见到所长他只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实际上这个字已经道尽了他的感受。孙先生的一生说复杂，也